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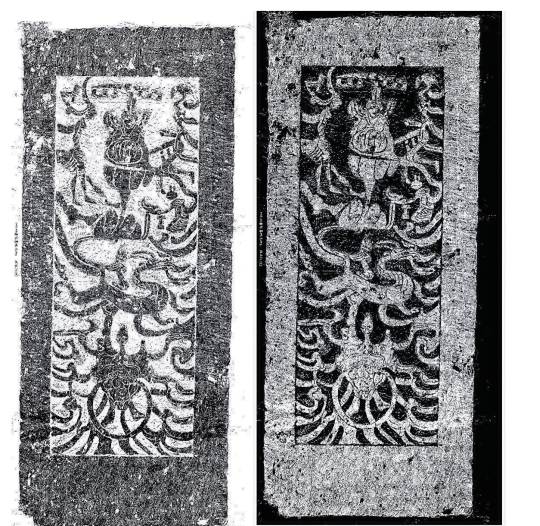
2025年,为配合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五期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墓葬(鲁家古墓M3),虽遭严重盗扰,但墓门及中室门柱上的五块画像石保存完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西王母、东王公画像,以罕见的“倒悬仙山”与“柱状连接”结构,形象演绎了“昆仑铜柱”的神话意象,并在山脚下清晰刻画河流,直观反映了“河出昆仑”的汉代地理认知。这批画像石是郑洛地区经科学发掘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实例,其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的信仰内涵,为研究东汉洛阳都城文化圈的丧葬艺术、神话体系乃至时人的宇宙观与地理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鲁家古墓M3(下称M3)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共出土有铜钱、盖弓帽、铜饰和骨簪等器物30余件。画像石出自墓门和中室甬道,分别在门版、门楣和门柱(中室)雕刻有画像,其中门版正反两面均有画像,共计5块,7幅画面,其中门版背面是一组西王母和东王公画像,分别为一号和二号画像石。

一号画像石背面图像为西王母仙境叙事。长方形边框内填画像,按上下、左右空间关系可分为西王母和辅首衔环两部分。上部以西王母为核心,内有侍从、白虎、玉兔、仙山等多种元素。画像顶部为一条鱼尾形帷帐,下飘两条彩带,西王母端坐于帷帐下面画中轴线上方,头戴三角冠,配有“胜”饰,面容圆润,身着宽袍,肩背生出张扬的翅膀,端坐于倒悬的四峰山神山之上。其两侧对称跪坐男女侍从,位于倒悬的三峰山神山之上;左侧侍从头戴冠饰,五官清晰,嘴巴张开,身着紧身衣服。右侧侍女头戴方冠,长发飘逸,手端仙丹。



一号画像石西王母



二号画像石东王公

西王母及两侧侍从均坐在倒悬神山之上,神山通过弧状或柱状结构与底部的山顶相连,数量与上部倒悬山相对应,构成“天地相通”的形态。其中西王母座下延伸出的五峰山,山脚下分出六条河流,五峰山右侧为玉兔跪在地面,执杵捣药。山下方绘一白虎,头朝左,呈奔跑状,长尾,口吐云气(或火焰),动感十足。下部单元为辅首衔环,主体为一只正面伏卧的螭螭,口衔圆环,其左上角伴有一只蹲卧的九尾狐。周围空间以流动的云气纹填充。画像石长166厘米、宽76厘米、厚14厘米。

二号画像石背面图像主题为东王公,与西王母题材布局相似,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核心为东王公,包括三足鸟、仙山、玉兔、青龙、羽人等元素。画像顶部为屋顶,有方形檐木,东王公坐在屋下中轴线上,头戴长冠,鹅蛋形脸,背部有两个羽翼,身着宽袍坐于倒四峰山之上。两侧分布站立男女侍从,左侧侍者为男性,呈站立姿态,头戴极长的冠冕,长发飘逸,背后斗篷,体型高大,三足。侍从头戴左侧有一只神鸟。右侧侍女头冠左侧有一神鸟。右侧侍女头冠左侧有一神鸟。右侧侍女头冠左侧有一神鸟。

东王公所坐倒四峰山与地面五山峰相连,连接柱上宽下窄。五峰山右侧为玉兔捣药,左侧有一只巨型脚。五峰山下侧为青龙,头朝右,嘴巴张开,四足奔跑,龙背上有一跪坐羽人驾驭。

下部主题为辅首衔环,与西王母画像石相同。衔环其他区域用云气纹填满,不排除部分云气纹为狐尾。尺寸与一号画像石相同。

郑州航空港区新见东汉画像石揭示汉代天地认知

常宏杰 段富森

画像石上的神话世界——核心要素解读

倒悬仙山与“天柱”本次发现的两位主神均端坐于画面中轴线上方,但其座下并非寻常的宝座或台基,而是“倒悬”的四峰山仙山。仙山山峰朝下,山体在上,形成一种违反常理却又充满玄妙感的悬浮状态。更关键的是,这倒悬的仙山并非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粗壮的柱状结构,与画面底部正常朝向的五峰山地面仙山紧紧相连。

西王母座下的连接柱,呈上窄下宽的样式;而东王公座下的连接柱,则为上宽下窄。这种细微的差异,可能并非工匠随意为之。《神异典》中记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36;21.)画像中这些连接天地、形态明确的柱状物,与文献中“昆仑铜柱”的描述高度契合。它们很可能就是汉代人想象中,用来沟通凡人世界与昆仑仙境的“天柱”之图像化表现。西王母与东王公端坐于倒悬仙山之上,正象征着他们高居于由“天柱”支撑的、悬浮于尘世之上的神圣空间,这一细节还原了汉人群对主神所处世界的想象,又并不完全违反物理规则的世界观。

“河出昆仑”的图像表达“倒悬仙山”与“柱状连接”构建了神话的空间结构,人间山脚下的细节则体现了时人对神话地理的具体认知。在西王母画像中,其座下倒悬仙山所连接的地面五峰山脚下,工匠用清晰的阴线,刻画出六条蜿蜒曲折、向外流淌的河流。这一图像细节,与汉代主流的地理认知“河出昆仑”之说严丝合缝。《汉书·地理志》与《山海经》等文献均记载,昆仑乃万水之源,多条大河发端于此。画像石以最直观的方式,将文献中的文字描述转化为视觉图像,确证了在东汉人的观念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不仅是一个神话场所,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地理特征(作为河源)的“真实”空间。

耐人寻味的是,在东王公画像中,其座下的地面仙山则没有任何河流刻画。这与西王母图像的“河出昆仑”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暗示着在汉代人的信仰地理中,东王公所居的东方仙山(或与蓬莱、岱舆等传说相关),并不具备昆仑山那样“天下水源”的独特地位。一幅画像、两个细节,生动展现了汉代神话信仰与早期地理知识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信仰体系这两幅画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单元。二者在构图布局上严格对称,但在细节上又各具特色,共同构建了东汉晚期流行的神仙信仰体系。

西王母头戴三角冠,饰有“胜”,肩生双翼,帷帐为鱼尾形,垂下飘逸彩带。其两侧为跪坐的男女侍从,右侧侍女手捧丹丸,下方有玉兔执杵捣药,呼应着西王母“掌不死之药”的经典神话母题。画像下方,还有口吐云气的奔跑白虎与螭螭衔环、九尾狐等祥瑞,仙境气息浓郁。

东王公则头戴长冠,背生双翼,坐于简单的屋宇檐缘之下。其两侧侍从形象极为特殊,均为站立姿态,身形高大,且皆为三足。左侧男侍冠后立一神鸟,右侧女侍冠饰直接为鸟形。这种“三足”特征,容易让人联想到神话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鸟”。若这一猜想成立,将东王公的侍从表现为“人格化的三足鸟”,或许暗示了东王公神格与太阳、阳乌(金乌)信仰存在某种关联,为理解这位相对晚出的男神提供了重要线索。画像下方,则有羽人驾驭奔驰青龙的场景,动感十足。

当前画像石研究中一般认为虽然郑洛地区较早出现画像石(砖),但并非画像石的主要流行区,这一认识主要基于画像石出土数量,尤其是东汉晚期,郑洛地区画像石十分稀少,因此,目前学界研究中通常将画像石分为四大区。本次科学发掘获得的这组画像石与其他区域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叙事风格完全不同,在具体工艺表现上也有明显差异,为构建该区域画像石艺术的年代框架与风格谱系提供了关键材料。

另一方面,这一发现为研究东汉洛阳都城文化圈的艺术风格提供了直接证据。将其与邻近的洛阳、许昌、新密等地已发现的东汉艺术遗存对比,可以观察到许多共性,如朱雀与辅首衔环的固定组合、青龙白虎与神树的搭配模式等。但“倒悬仙山一柱状连接”这一核心构图,在本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显得尤为独特,很可能代表了东汉晚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在吸收各地艺术养分后,形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性艺术表达。这对于理解汉代艺术“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原样式”的具体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最后,本次发现的神话题材是一扇窥探汉代人精神世界与宇宙观的宝贵窗口。“昆仑铜柱”与“河出昆仑”的图像,将抽象的神话概念和地理认知转化为具体的视觉形式,生动揭示了汉代人如何用已知的时空经验(如山、柱、河)去理解和构造未知的仙境与彼岸。这不仅艺术创作,更是哲学观念的另一种体现。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联合大学)

溯源“撸串”:考古所见战国秦汉的烧烤

喻世洁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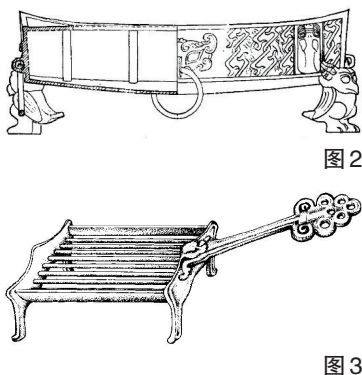


图3

环,并有链条相接。一些架式烤炉,体型小巧,便于携带。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方形烤盘造型格外精致(图2),高11厘米、边长27厘米、盘深4.8厘米。另有一类便携式烤架或许可置于炭炉中直接使用,像南昌蛟桥东汉墓出土的1件带柄铁烤架(图3),中间置7根架条,长35厘米、宽15厘米、高11厘米。

串食材所用签条,分单根和叉状两类。单根签属细签,主要分竹、木、铁三种材质。签的长度则匹配相应的烤盘尺寸,像上述的南越王墓这件烤盘,伴出的还有一捆放在竹筒内的铁签,长条形,两头尖细,中间略粗,直径0.4~0.8厘米、长28~35厘米。画像石烤串场景中可能大多使用的都是此类细签。在汉代的西北地区,还发现过木签(图4),其优势就是就地取材,同时利用树枝自身独特的香味,用于去除腥膻,与当代该地区红柳枝烤肉的传统具有明显传承关系。有趣的是,无论实物或画像中的签条,每根上可见食材却大多是4块(个)。

叉状签体型较大,又分两股或三股,后端带有长柄,总长超半米,主要用于烤制大块肉食。这正是北魏《齐民要术·炙法》中所提到的“两歧簇两条簇炙之”的烧烤用具。南越王墓中出土过两件类似铁叉,二股、三股又各一件,竿长约60厘米、叉长约20厘米。

再说烧烤的燃料。相较于直接用树枝,炭火温度高,火力集中,受热更均匀,既能将肉块表面烤得焦香酥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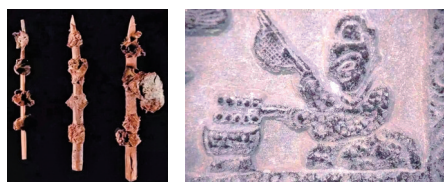


图4



图5

能最大程度确保肉的内部汁水不流失,获得更好的口感。烤肉所用的木炭中,首选一些诸如枣木、桑木这样的硬质杂木,其木质密度高、分量沉,耐烧,无烟,且有天然香气,在当时就备受青睐,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就有“桑炭甚美”的记载。出土的木炭实物也有一些,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炉盘,下方的炉内盛木炭,较大者有13块,块形规整、尺寸均匀,树种经鉴定属于栎类硬木。文献记载的木炭的生产和使用在两汉时期更加普遍,与烧烤相关的图像和实物也有不少。前述诸城前凉台、临沂五里堡等汉墓画像石图像中还可见烤串时用扇子助燃木炭的场面(图5),画面生动,还原度极高。

以上不难看出,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先民已经掌握一套完备的炙烤技艺。从食材搭配、工具选择到燃料利用,处处蕴藏实用的饮食经验。古今烧烤一脉相承,这些出土文物与图像史料,正是连接上古烹饪习俗与当代大众烧烤饮食最好的实物见证。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上接6版)

2025年5月11日上午询问发掘者许伟先生,他说:“大都有居住活动面痕迹。最上面是烧土块+木炭+大量陶片,像有意打碎铺垫的,一处很神秘的房址。”

白燕2号房屋里出土了一件釜形甗,还有一件比这件更早,也出土在房屋里。以前晋中没有陶釜。这种釜形甗只能产生于渭河、涑水河一直到伊洛河流域的横窄地带。见之于太原盆地,当被认为是输入的或外来影响的制品。这些釜形甗,开启了晋中地区早期陶釜手甗的先河,黄河流域最先产生陶甗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晋中地区,另一个是陕西渭水流域,盛产单把甗。

白燕三期即张先生命名的“杏花文化”,是白燕遗址提供的线索,即杏花村遗址四期,以鬲、甗、瓮、尊、罐、盆、钵为其代表性器物,鬲、甗、瓮,特别是鬲,数量占相当大比例,甗带腰鬲,鬲以侧装釜手甗为主,辅以单把鬲及无把无釜鬲。这些陶器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故在此称之为杏花文化。这个文化的鬲的形态,存在着一个由宽裆裆经宽平裆至尖角裆演变的完整系列。在以不同形态陶甗为特征的诸史前文化中,这是和客省庄文化并列的考古学文化中最强劲的考古学文化。

杏花文化釜手甗杏花村H118最早(图3),H118:9釜手甗和H118:10单把鬲是目前在所有陶甗中最早的两件鬲,向山西全境包括陶寺、绛县周家窑、垣曲古城东关、高平西李门、沁水八里坪和东南部是河南济源店街遗址等遗址,还有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冀邻山西北等地传播,也产生了釜手甗的“变异”,由侧装逐渐变异成正装釜手甗了,就是一个釜手按在两足之间,另一个釜手在剩下那一足的正中,还小一些,如发现石头城墙的陕西神木石峁等。

侧装和正装釜手甗,困惑了整个学界二十多年。我曾考虑过是因北方地区陶土含沙量较高的缘故,也做过多个遗址、多件正装釜手甗的统计,结果发现有大中小;也向陈雍先生多次请教,终未果。去年阅读忻州游邀报告,双墓各式各样,有鸡冠耳状的、有瓦片贴附状的两类,这两类又可细分为弯曲、直线形的鸡冠耳状,和方块、椭圆形的瓦片贴附状,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地区因釜手不再承重,越来越具有装饰性了,也就变为了正装了。起源于杏花文化中的侧装釜手甗,直接传播或间接影响到陶寺、石峁等地,因此称作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器物。

我的认识:白燕杏花,成就陶寺。

由于地处塔儿山北麓的陶寺遗址,第一个简报将当时还不多见的直口直领下连三个肥胖袋足、口沿下施二个对称釜、通

体拍绳纹的大型甗,在“结语”中十分形象地称为“直口肥足甗”,反而使人忘记“侧装双釜手”客观属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30页,《考古》1980年第1期。),导致学者们长期对其来源模糊不清,包括我在内的,实际上是侧装双釜甗(图4)。

杏花村118号灰坑最早,陶寺望尘莫及。我在2025年依据张忠培先生的“杏花文化是侧装双手陶甗的大本营,并以此区别于以单把鬲为特征的客省庄文化,故东关文化双手陶甗的产生当是接受了杏花文化影响的结果”等观点,论证所谓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石峁文化、游邀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等等,或是杏花文化的变体和分支,分布面积达到25万平方公里。

白燕2号房址里还出土了一件泥质罐(F2:107),彩绘蜥蜴也可以称为蜥蜴龙,是襄汾陶寺大型墓中随葬蟠龙盘的前身,这一点也是苏秉琦先生首先指出来的,《赤峰红山后》报告中有一片彩陶片上便是龙纹(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图146)。内蒙古赤峰魏家窑铺彩陶壶(F54:2)和河北蔚县四十里坡彩陶罐上的鳞片,也是“龙纹”,与蜥蜴龙共生生成陶寺的蟠龙。论其渊源,还要看陕西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陶钵(T1534H25:6)上蜥蜴龙。

还有双层折腹盆,白燕2号房址到杏花村2号灰坑(H2:4),再到陶寺墓葬(M2168:3、M2035:1),陶寺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垣曲古城东关也有一件。

要溯陶唐氏或唐尧,汉郑玄《毛诗·唐风·唐谱》说的“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处。此后乃迁河东平阳”。

魏、西晋时期皇甫谧(215年-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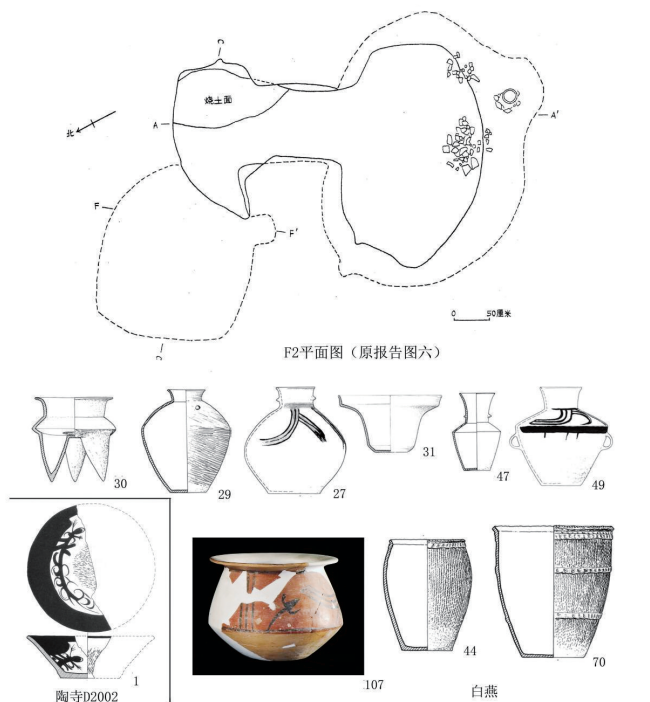


图2 白燕F2平面及出土部分陶器图及与陶寺早期墓葬浅腹盆比较

白燕F2:30 釜形甗 29 小口壶 27 釜 31 双层折腹盆 47 长颈双壶 107 泥质罐 49 釜 70 夹砂缸 44 夹砂罐甗口D2002:1 浅腹盆



图3 汾阳杏花村118号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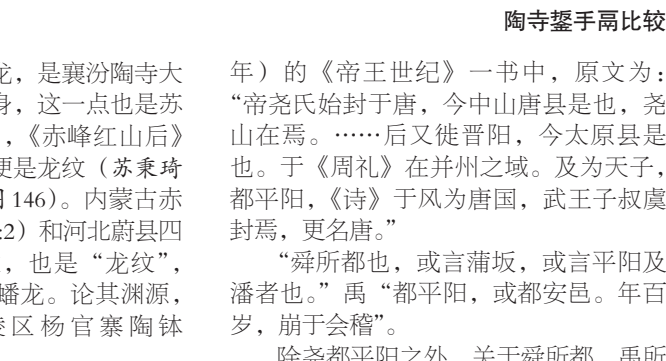


图4 杏花村、陶寺釜手甗比较

年)的《帝王世纪》一书中,原文为:“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唐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是也。于《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诗》于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

“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者也。”禹“都平阳,或都安邑。年百岁,崩于会稽”。

除尧都平阳之外,关于舜所都、禹所都皇甫谧也不敢肯定,只是说“或者”罢了,但这条记载“于《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可做考证。

随着白燕报告的出版发行,关于陶唐氏或唐尧的问题,即将日益明晰起来。最后我想说,白燕、杏花、陶寺,这是两代考古大家的战略布局,才使我们对远古时代有了超越前人的认识。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 广告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智慧管理 智慧服务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物修复实验室装备...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 人员管理、客流监测 数字资源管理...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13572270596 (张总) 座机: 029-88246388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 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F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